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七卷
(2004)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上海圓明講堂

合辦

中華書局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七卷

Volume VII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合辦

上海圓明講堂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7卷/季羨林, 饒宗頤主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ISBN 7-101-03849-2

I. 敦... II. ①季... ②饒... III. ①敦煌學—研究—文集 ②文物—研究—吐魯
番盆地—文集
IV. 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12154 號

書 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七卷

著作責任者: 季羨林 饒宗頤 主編

責任編輯: 柴劍虹 王守青 張進

國際書號: 7-101-03849-2/K·1755

出版者: 中華書局

地 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印刷: 北京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發行 者: 中華書局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3 印張 57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58.00 元

目 錄

論文

- 伯希和、羅振玉與敦煌學之初始 孟憲實(1)
- 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 高田時雄(13)
- 日本外務省藏大谷探險隊外交記錄介紹
- 以第三次大谷探險隊員橘瑞超下落不明問題為中心 白須淨真(28)
- 奧登堡在莫高窟(1914—1915) 府憲展(52)
- 許國霖與敦煌學 余 欣(66)
- 驚沙撼大漠
- 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 榮新江(99)
- 評莫高窟土地廟藏經來源問題的探討 李正宇(128)
- 唐詞、唐曲子及其相關問題 徐 俊(138)
- 中國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的創立與發展簡述 白化文(156)
- 敦煌秘笈目錄(第443號至第670號)略考 落合俊典(174)
- 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研究述略 王素、李方(179)
- 敦煌佛教律儀文書研究的回顧 湛 如(192)
- 論20世紀的敦煌道教文獻研究 劉 屹(199)
- 敦煌出土《尚書》寫卷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許建平(223)
- 敦煌文獻和變文研究回顧 荒見泰史(241)
- 敦煌蒙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鄭阿財(254)
- 臺灣地區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與展望 朱鳳玉(276)
- 敦煌曆日文獻研究的歷史追憶 鄧文寬(290)
- 敦煌占卜文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黃正建(298)
- 敦煌西域出土胡語醫學文書研究述略 陳 明(311)
- 敦煌漢傳密教經典研究:以《金剛峻經》為例 郭麗英(327)

回鶻僧與《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	楊富學(338)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道教遺書研究報告	王 卡(345)
敦煌寫本《張議潮處置涼州進表》拼接綴合與歸義軍對涼州的管理	鄭炳林(381)
佉盧文書分類及其他	劉文鎖(390)
簡論中國古代曆日中的廿八宿注曆	
——以敦煌具注曆日為中心	華 瀾(410)
敦煌曆日“沒日”和“滅日”安排初探	馬若安(422)

紀念文

懷念楊廷福

——玄奘取經路線調查的回憶	馮其庸(438)
紀念法國漢學家蘇遠鳴先生	郭麗英(443)
鍾興麒《西域地名考錄》序	馮其庸(448)

書評

邵瑞祺《犍陀羅佛教文獻》	陳 明(451)
方廣錫《敦煌學與佛教學論叢》	郝春文(456)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	劉 屹(463)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	王媛媛(469)
夏 鼎《敦煌考古漫記》	沈睿文(474)
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	孟憲實(480)
孫繼民《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	孟憲實(484)
童 丕《敦煌的借貸》	劉進寶(489)
汪海嵐《〈泰晤士報〉上的斯坦因》	榮新江(496)
汪海嵐《英國所藏斯坦因收集品手冊》	榮新江(499)

新書目

編後語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Volume VII

Contents

Articles

- P. Pilliot and Luo Zhenyu; The Early Stage of Dunhuang Studies Meng Xianshi
Searching for Books; The Visitors of the Kyoto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in Beijing in 1910
..... Tokio Takata
The Diplomatic Documents Concerning Otani Expedition Kept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Japan Shirasu Joshin
S. F. Oldenburg at the Mogao Grottos; 1914—1915 Fu Xianzhang
Xu Guolin and Dunhuang Studies Yu Xin
Xiang Da's Visit to Dunhuang and its Academic Meaning Rong Xinjiang
The Origin of the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Tudi Miao of Mokao Grottos Li Zhengyu
Ci or *Quzi*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ssues Related Xu Jun
The Catalogues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A Brief Survey Bai Huawen
Catalogue of the Secret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 Remarks on No. 433 to No. 670
Studying the Dunhuang Documents Found in Turfan; A Brief Survey
..... Wang Shu & Li Fang
Studies on Buddhist Vinaya Texts from Dunhuang; A Retrospect Zhan Ru
Studies on Dunhuang Taoist Texts in the 20th Century Liu Yi
Studies on the Manuscripts of *Shangshu* Found in Dunhuang; Past and Future
..... Xu Jianping
Dunhuang Texts and the *Bian - Wen* ; A Retrospect on Their Studies Arami Yasushi
Studies on the Children's Teaching Book from Dunhua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Zheng A - Cai

Dunhuang Literature Studies in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Zhu Fengyu
Studies on the Texts of Calendar from Dunhuang: A Historical Rethinking	
.....	Deng Wenkuan
Studies on the Divination Texts from Dunhuang: Retrospect and Expectation of	
.....	Huang Zhengjian
The Non – Chinese Medical Texts Unearthed in Dunhuang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	Chen Ming
The Esoteric Buddhist Texts from Dunhuang: A Case Study of the <i>Jin'gangjun Jing</i>	
.....	Kuo Liying
Uighur Buddhist Monk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angut <i>Triptaka</i>	Yang Fuxue
The Taoist Texts from Dunhuang Kept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 Research Report	
.....	Wang Ka
An Official Document of Zhangyi Chao and Guiyi Jun's Administration of Liangzhou	
.....	Zheng Bingl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Karos .t hī Manuscripts and Related Issues	Liu Wensuo
Remarks on the Twenty – eight Lodges in Ancient Chinese Calendar	Alain Arrault
The “Mo – ri” and “Mie – ri” in the Calendar from Dunhuang ...	Jean – Claude Martzloff
Preface to <i>The Place Nam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i>	Feng Qiyong

Memoritum

In Memory of Prof. Yang Tingfu: A Recall of the Investigation on Xuanzang's Route	
.....	Feng Qiyong
In Memory of Prof. Michel Soyumiš	Guo Liying

Book Review

Richard Salomon, <i>A Gāndhārī Version of the Rhinoceros Sūtra: British Library Kharos .ī hī Fragment 5B</i>	Chen Ming
Fang Guangchang, <i>An Analects on Dunhuang Studies and Buddhology</i>	Hao Chunwen
Wang Chengwen, <i>The Dunhuang Version of Ling – bao Jing and Taoism from Jin to Tang</i>	
.....	Liu Yi

Contents

Lin Wushu, <i>New Reflections on Nestorianism of the Tang Dynasty</i>	Wang Yuanyuan
Xia Nai, <i>Notes on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n Dunhuang</i>	Shen Ruiwen
Hou Can – Wu Meilin, <i>A Collection of Brick Epitaphs Unearthed from Turfan</i>	Meng Xianshi
Sun Jimin, <i>A Study of the Hanhai Jun Docu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i>	Meng Xianshi
Éic Trombert, <i>Le crédit à Dunhuang :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i>	Liu Jinbao
Helen Wang, <i>Sir Aurel Stein in The Time</i>	Rong Xinjiang
Helen Wang, <i>Handbook to the Stein Collections in the UK</i> ; Éva Apor and Helen Wang, <i>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i>	Rong Xinjiang

伯希和、羅振玉與敦煌學之初始^[1]

孟憲實

沒有資料的公佈就沒有相關的研究，敦煌學的百年歷程，每一次進步都與資料的公佈密切相關。考慮一門學問的正式揭幕，應該有幾個方面的特徵不可忽略，一是資料的規模公佈。資料作為研究對象，沒有一定規模，就不能支撐起相對獨立的學科。二是研究規模展開。這是任何一個學科之所以成立的基本條件。三是對後續研究的跟進產生引導作用。敦煌資料流出藏經洞，在斯坦因到達之前已經開始，對敦煌藏經洞流散出來的部分文物進行研究，部分學者如葉昌熾也已經開始^[2]。清宣統元年（1909 年）八月，伯希和將在敦煌獲得的大批文書運回法國以後，雖然祇攜帶一小部分文書再次來到中國北京，但畢竟使得敦煌寶藏大白於天下。1909 年的秋天，百年敦煌學在中國北京正式拉開帷幕。本文考慮的是在敦煌學剛剛發生時的幾個具體問題：伯希和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公佈的藏經洞消息，羅振玉起的實際作用，以及同一消息在中國和日本引起反應的異同等。

—

伯希和 1909 年夏天到達北京，敦煌藏經洞的消息從此廣為人知。伯希和公佈藏經洞的消息，究竟是他的固有計劃，還是偶然因素導致的呢？對此，較少有人提出疑問。但是，給人印象比較突出的是強調伯希和的主動公佈。有的研究者十分明確地寫道：“伯希和路過北京，將其所獲敦煌文書的一小部分展示給在北京的一些學者。”^[3]有的說法更積極：“1909 年，伯希和攜帶少量文書，從河內赴北京，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展覽會。當時我國學者羅振玉、王仁俊、蔣斧、董康等觀後，從此始知敦煌的文物寶藏。”^[4]從展示到展覽會，伯希和公佈敦煌消息的積極性被描繪得很高昂^[5]。

對於這個問題，羅振玉早年有一個說法。伯希和得知藏經洞的消息後，“亟往購得

十巨篋，然僅居全書三分之一，而所有四部各書及經卷之精好者，則垂盡矣。今其所得，已大半寄回法國，藏之巴黎圖書館，尚餘數束未攜歸。吾友董授經京卿康以此事見告，乃與同好往觀”^[6]。董授經即董康。羅振玉自己承認，他得知伯希和與藏經洞的消息是來自董康，那之前，他自己與伯希和還是素昧平生的。

那麼，董康的消息又來自何處呢？根據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的《澄齋日記》，我們對此事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在日記中記載道：

乙酉八月二十一日酉刻，赴六國飯店共宴法蘭西人伯希和。……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寺，寺有石室數百，唐人謂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壁滿繪佛像及造像人畫像，年代相沿久矣。光緒庚子，寺僧因壁敝欲修之，鑿壁而室見，藏書滿中，僧不知其可貴也，稍稍流落人間。丁未（光緒三十三年）冬，法蘭西人伯希和遊歷迪化府，謁將軍長庚，將軍示以石室書一卷，且語其事。迨過安西州牧，復贈以一卷。伯希和充東方會長，素留意中國古學，頗悉源流，審視所贈書，乃唐人寫本也。亟詣其處，以銀元數百元購得十餘箱，僅居石室中全書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書及經卷之精好者，則均囊括而去矣。

尚餘殘書數束，攜以來京，王叔衡、董授經偵知之，乃介一美利堅人見伯希和，因得假觀，並用攝影法付印，紙墨款式，定為唐蹟，了無疑義。中多人間未見久佚之書。即有見者，亦較今本多異，文且完足。藏碑有石晉開運、宋太平興國年號，疑是宋初人避西夏兵亂，鑿壁以藏其書，且彩飾畫像於壁，以掩其跡耳。

書衡、授經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餘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與焉。伯習華語，專治中國古學，席間縱論版本，辨析真贋，即在吾輩，猶推博洽，況歐施也。

獨是此書自宋至今千餘年，風雨兵火所未毀，道俗樵蘇所未傷，山靈護存，幸而發見。地方官吏紳衿，曾無一人過問，乃舉而付諸法蘭西人之手，重洋萬里，輦歸巴黎，豈非至可恨可傷之事，吾輩尚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責，身為學使之陳蘇生，所司何事，豈竟不一問耶？可恥甚矣。^[7]

惲毓鼎的感慨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此前兩天即八月十九日，羅振玉在寫給《時務報》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也用“可恨可悲”和“可喜”表達自己對敦煌藏經洞文物發現與散失的感慨。惲毓鼎的日記對於伯希和此次來北京與公佈敦煌文書的關係描寫成“王叔衡、董授經偵知之，乃介一美利堅人見伯希和，因得假觀。”“偵知之”三字，透露出了伯希和的神秘形象，那麼敦煌藏經洞的消息和他所攜帶的敦煌文書從伯希和一方看就有從秘而不宣到被迫示人的一個過程。伯希和雖然對外出示了敦煌文書，但還是經

過美國人的中介，董康等中國學者纔有機會目睹的。這個中介的存在，說明當時伯希和與北京的中國學者之間尚未建立起基本的溝通。

董康等如何“偵知”的呢，沒有明文證實。因為有一個美國人的中介，消息來自這個美國人也是有可能的。白化文先生曾經親聞王重民先生說過另一種情況，至少可以當作口述史學的資料。王重民先生說，是琉璃廠修補古書的師傅發現了伯希和攜帶的敦煌文書，因為伯希和曾經把這些殘破的文書拿到那裏修補^[8]。這個消息可以看作是董康等“偵知”行動的一個可能的補充。同時，敦煌文書確實殘破，而伯希和確實攜帶了部分文書到達北京。這也可以看作是推測補充。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伯希和自己的說法。伯希和此次來中國的目的，根據伯希和自己的講演，是我們最重要的證據：

同伴先歸，所得之物大宗隨之，余則視印度支那如故鄉，睽隔多年，亟欲知彼中人事之變遷、學界之動作。乃往河內留四月，復來中國，為購書也……乃於北京、南京、上海三處買印本書約三萬冊。至是，邦人委託之事一律報命。正欲回國，而敦煌得寶之風聲籍籍傳播。端制軍聞之扼腕，擬購回一部分，不允，則諄囑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且曰，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制軍人頗殷勤，屢次接見余，禮有加焉。至北京，行篋尚存秘笈數種，索觀者絡繹不絕。諸君有端制軍之風，以德報怨，設盛宴邀余上坐。^[9]

很清楚，伯希和原來沒有在中國公佈得寶消息的計劃，在所有的其他計劃如購書等“一律報命”之後，“正欲回國，而敦煌得寶之風聲籍籍傳播”。中國人得知伯希和敦煌得寶的消息，究竟通過什麼渠道，現在仍然說不清楚，但伯希和在北京公佈敦煌藏經洞消息和出示所攜帶的敦煌文書不是他原有計劃則是無疑的。

伯希和到達北京，是要瞭解中國學界的動態、購書，然後回國。他後來離開北京是乘火車從俄羅斯返回法國，而這正是當時中國與歐洲交通的最常用路線。這就是說，購書的計劃完成以後，他是準備按照既定的旅行路線回國的。但是，敦煌得寶的消息意外透露了。他祇好順水推舟，表現十分良好。他很感激的是，中國學者的君子態度，對他待以上賓，並且使用了“以德報怨”這個意味深長的詞。

到達北京之前，在南京，伯希和先見了端方。這不是第一次見端方，根據他的演說，在大批敦煌寶物運送回國以後，他在上海、無錫一帶停留一月，“照端制軍及裴景福所藏金石書畫”。當時，他對敦煌一事似乎沒有透露任何口風。從河內再來中國，端方纔得知伯希和的敦煌獲寶。端方對敦煌文書的學術認識很清楚，“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

死問題也”，判斷很深刻。同時，端方也希望採取措施，比如再行購回等等。但伯希和肯定沒有對端方說敦煌還有卷子的消息，不然以端方的地位和判斷一定不會不動聲色。伯希和見端方，當在1909年的6月，因為同月的9日，伯希和在端方的《且渠安周碑》上用法文題寫了跋文^[10]。那麼，伯希和在北京遇到的“敦煌得寶之風聲籍籍傳播”情況，很有可能是來自端方的。

那麼，伯希和為什麼要隨身攜帶敦煌卷子呢，難道這不是為了到北京公佈消息甚至取重中國的學術界嗎？當然不是。在大批敦煌寶物運送回國以後，伯希和並沒有一同回國，他在河內還有四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他對所獲敦煌寶物實際上已經進行了若干研究。比如《惠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羅振玉從伯希和處看到的時候，伯希和已經把他的研究結果告訴了羅振玉，所以羅振玉在公佈的時候，鄭重寫到“伯君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定為惠超所著”^[11]。伯君即伯希和，他的這個研究結論不可能在沒有《一切經音義》的地方得出，最大的可能是在河內的研究結果。所以，他隨身攜帶的敦煌文書和目錄，是為了自己的研究，並不是為了公佈。至於又帶到北京，那是為了帶回法國，因為他的行程是在上海、南京、北京購置圖書之後，直接從北京經由俄羅斯回國。

消息既然泄露，伯希和從容應付。令他吃驚是中國學者的“以德報怨”態度。因為其中包含了對中國學者的歉意，是否因為他曾經計劃對敦煌得寶的事情秘而不宣呢。中國學者的真正態度可以羅振玉為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寫給《時務報》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說道：“茲有一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寫木刻本古書是也。此書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運回法國，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藝文志》所未載），弟與同人釀貲影印八種，傳鈔一種，並擬與商，盡照其已攜歸巴黎者，此可喜也。聞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擬與當道言之，迅電毛實君，餘存不知有否，但有，盡力聳動之，前車已失，後來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書錄》數紙，隨後印成寄奉，公閱之當亦且喜且悲也。”^[12]羅振玉的可喜可恨可悲，是當時中國學人的真正心態。但對於伯希和本人，大家卻表現出寬容甚至感激的態度，而這與伯希和事先的猜測距離甚遠，故有“以德報怨”之說。

羅振玉《集蓼編》中所謂“約同志數人觴之”。羅繼祖《庭聞憶略》中說羅振玉“約同志數人，共宴伯氏”，當然是同一件事。這就是伯希和說的“設盛宴邀余上坐”一事。根據當時也在北京的日本田中慶太郎的說法，這是北京讀書人主辦的對伯希和的歡迎會，時間是九月四日，地點就是六國飯店。確切地說，這是一次宴會，也可以說是一次招待會，但決不可以說是伯希和的敦煌展覽會。這個宴會可能是羅振玉發動的，但他自己

因病沒有出席^[13]。

後來，伯希和與中國學界的往來一直很友好，對於敦煌學在中國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一切都是不容抹殺的。但他在1909年秋天的北京之行，原本沒有公佈敦煌秘密的計劃，這應是敦煌學史上的一個事實。

二

在當時的北京學者群體中，羅振玉成為敦煌資料公佈與研究的核心人物，這除了他的學術修養與觀念敏銳以外，他與伯希和關係的建立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中國敦煌學的正式起步，羅振玉成為發動與引導者，追蹤這個歷史，我們的目光不能不回到伯希和1909年再次到達北京的那些日子。

羅振玉是怎樣與伯希和相識的，這是一個並非無關緊要的問題。不過，對於這個問題，羅振玉自撰回憶平生的《集蓼編》對此的記述文字向來倍受重視，他寫道：“光緒季年，歐人訪古於我國西陲者，為英、德、法三國。宣統紀元，法國大學教授伯希和博士，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軸已先運歸，尚有在行篋者。博士托其友為介，欲見予，乃以中秋晨驅車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寫本及石刻，詫為奇寶，乃與商影照十餘種，約同志數人觴之。”^[14]羅振玉寫《集蓼編》已是晚年，在辛未年（1931）的秋天，當時他已經六十六歲，寫作目的他自己在序言中說是為了給自己的兒孫們看的，“且自敘語皆質實，較異日求他人作表狀，以虛辭諛我，不差勝乎？”

根據羅振玉的回憶，是伯希和主動邀請約見羅振玉的。這個說法被廣泛引用。董作賓的《羅振玉先生傳略》對於這個問題，基本上是照錄《集蓼編》：“宣統初伯希和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啓行返國，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軸已先運歸，而以尚存於行篋者求教於先生。伯氏出示唐人寫本及石刻，先生詫為奇寶。”^[15]有所不同的是，董作賓認為伯希和正是為了求教羅振玉關於敦煌古卷的問題纔主動與羅振玉結識的，這比羅振玉自己的說法更進了一步。

羅繼祖的記憶是伯希和攜帶一部分敦煌卷子到北京，“事頗傳於士大夫間。伯氏也願與祖父訂縞紵之交。祖父乃於己酉（宣統元年，1909年）中秋晨往會晤，見其所攜帶寫本及石刻，驚為瑰寶，與商影照十餘種，約同志數人，共宴伯氏。這是祖父得見敦煌卷軸之始”^[16]。伯希和主動約見羅振玉，許多著述都採用這個觀點。如楊升南《羅振玉傳略》等^[17]。

上文可以證明，這些流傳甚廣的說法是不可靠的。事實並不是伯希和要見羅振玉，

更不是要請教羅振玉，而是羅振玉從董康那裏聽到了伯希和有經卷，然後主動前往的。

羅振玉見到敦煌文書是與伯希和見面的那一天，即八月十五日早晨。抄寫和拍照工作隨即展開。根據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一文，羅振玉很快將在伯希和處看到的敦煌文獻和目錄公佈於衆。這篇最早的書目報告發表在《東方雜誌》宣統元年九月的第六卷第十期上。《東方雜誌》是月刊，每月的二十五日發行。在這篇報告的序言中，羅振玉稱伯希和為“伯希利”（或許是手民誤植），最重要的一句是“昨往觀，將所見及已寄回之書目，略記於左”^[18]。這個“昨”字透露出的消息是，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是八月十六日。也就是說，從八月十五日到十六日兩天，羅振玉已經抄寫了所有的目錄，並把看到的也記錄了下來。因為這篇文章用兩段文字記述所見的敦煌文書，先是伯希和提供的已經送回法國的目錄，後是羅振玉親見的文書目錄。

在羅振玉後來的《鳴沙石室佚書序》中，他寫道：“宣統改元，伯希和博士始為予言之。既就觀目錄，復示以行笈所攜。一時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亟求寫影，遽承許諾。”^[19]如果這個序言在描寫當初在伯希和住處所見是真實的話，那麼伯希和給羅振玉先看的是目錄，後看的是文書原件。因為這除了羅振玉如此描寫之外，也與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一文的行文順序吻合。伯希和隨身帶着一個簡目，羅振玉一見就開始抄寫。然後，伯希和又出示了另外一部分原件，羅振玉繼續抄寫。不過，懷疑對於原件部分，羅振玉開始祇抄寫了目錄提要之類。因為在他的文章中，對於這個部分做的標示是“以上諸書皆目見”。

拍照文書的事情也很快開始了。羅振玉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說“釀貲影印八種，傳鈔一種”。所謂釀貲就是集資，是同人湊錢影印。看來這些影印費用不菲。這封信是八月十九日發出，說明影印工作已經進行。他在後來的信中，還向汪康年推銷這些影印件。都是什麼人參加了這次集資活動，現在還不能都知曉，不過蔣斧在《沙州文錄》序言中寫到：“今年秋，遇法蘭西學士伯希和於京師，讀其所獲敦煌石室書卷，其完整者已由同人釀金影寫……”^[20]那麼蔣斧一定屬於集資人之一。根據惲毓鼎的《澄齋日記》，董康等也參與其中。

影印的資料目錄，在羅振玉不久以後寫的《敦煌石室秘錄》一文中公佈出來。這是一篇更清楚的介紹文章，也是發表在《東方雜誌》上，是緊接着上一期，在同年的十一期、十二期上連續刊出的。文章開篇有按語：“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緣起，已見前期雜誌。此篇敘述較詳且確，並有考證語，故重錄之。”^[21]看來這是編輯的按語。文章改變上一文的行文順序，分為書卷、雕本、石刻、經像、壁畫、古器物等六部分，最後是餘

記。其中，已經影印的專門標出，即有：尚書顧命篇殘頁、西州志殘卷、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金剛經、溫泉銘、化度寺邑禪師塔銘、柳公權楷書金剛經、老子西昇化胡經、景教三威蒙度贊、摩尼教經殘卷等共十件。在沙州志之後注曰“端制軍已影照”。在惠超往五天竺國傳之下注曰“抄出”字樣。羅振玉等人集資影印的共十件，但在給汪康年的信中還說是八件，說明當時影印工作已經完成大部分，但尚未最終結束。

除了珍貴資料影印以外，其他的文書則進行了抄寫。蔣斧的《沙州文錄》序中寫道：“所餘叢殘文字，皆足考見沙州沿革，補正舊史。乃與同縣王捍鄭太守，盡二日之力手錄之。”該序標明的時間是“宣統元年九月”^[22]。與蔣斧同時抄錄的王捍鄭即王仁俊。王仁俊很快出版了他的《敦煌石室真蹟錄》，時間也在這一年的九月，在國粹堂石印出版，共六冊。他在書的序言中說他在伯希和的住處“懷餅就抄者四日”。與蔣斧所說時間有出入。而羅振玉在《敦煌石室秘錄》的文字中，還有一個十餘日的說法，所謂“與儕輩十餘日奔走逐錄”^[23]。大約從八月十五開始，羅振玉等就沒有空閒，十多日奔走抄寫，辛苦異常，以至於到了九月四日的六國飯店宴會的時候，羅振玉竟然因病不能參加了。

從伯希和處，羅振玉得知敦煌藏經洞還有文書，於是立刻開展活動，最終說服政府收回這批文書，這是伯希和在北京透露的最重要消息。另外，伯希和還說到了斯坦因。關於斯坦因的事情，羅振玉在八月十六日的文章中一點也沒有提及，估計當時他還不知道，也就是說伯希和並沒有把藏經洞的所有情況全部都告訴羅振玉。但羅振玉在第二篇文章的餘記部分卻寫到了，當時伯希和應該已經離開。羅的文章說：“伯希和君言英人某亦嘗遊窟室，購取不少，而以旁行書為多。伯君返國，擬往倫敦一觀，允寄其目，不知其中更有秘笈幾許，耿耿此心，與伯君歸帆俱西馳矣。”

可見，關於斯坦因的消息，伯希和透露得較晚。而“英人某”這種說法，可能並沒有道出斯坦因的名字。即使在羅振玉的這篇文章以後，關於斯坦因在敦煌獲寶的消息仍然所知不廣。《東方雜誌》屬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就屬於上海商務印書館，但他在1910年訪問歐洲之前並不知道斯坦因的事情。他是在法國見到伯希和之後，纔知道的。“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24]

伯希和在北京，與中國學術界維持了相當友好的關係，允許抄錄，在中國學者看來就是一件功德。但是，伯希和並沒有因此改變他的行程，也就是說，中國學者在他那裏抄錄，時間依然是緊迫的，許多文書並沒有來得及抄錄。羅振玉在《敦煌石室秘錄》最後部分的文字可以證明：“石室秘藏此次借影者，計書卷六，雕本二，石刻三，壁畫五，其

紙敝故不可影者，則錄之，但期日勿遽，不獲備寫，心長晷短，此憾如何！”伯希和九月十一日從前門登上火車，中國學者的抄錄工作至此結束。許多人應該前往送行。“耿耿此心，與伯君歸帆俱西馳矣。”這決不是祇有羅振玉纔有的心聲。

羅振玉等從伯希和處影印好抄錄的敦煌文書，成為第一批公開的敦煌文獻。羅振玉的兩篇介紹文獻，再加上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蹟錄》（1909年9月），羅振玉、蔣斧的《敦煌石室遺書》（1909年11月），成為世界敦煌學研究歷史上第一批研究著作。伯希和的這批文書，因此成為敦煌學最早的一批研究資料，為敦煌學的後來發展，起到了引導和推動作用。

三

伯希和在北京的日子裏，接待的不僅僅是中國學者。在北京開辦文求堂書店的日本田中慶太郎也適時地訪問了伯希和，伯希和介紹了敦煌文書的發現過程。同年十一月，田中慶太郎在日本人於北京辦的《燕塵》雜誌上，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為題撰文介紹了這次拜訪和所見所聞，在敦煌文書方面，他全面介紹的是羅振玉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一文^[25]。他是日本最先瞭解敦煌藏經洞的人。

不過，真正引發日本敦煌熱潮的卻是羅振玉的通信。當時，因為羅振玉與日本學界來往密切，關於敦煌發現古代文獻的消息，羅振玉立刻致信日本田中治兵衛，內藤湖南得到這個消息，親自寫了新聞稿，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一月十二日在東京、大阪兩地的《朝日新聞》上以《敦煌石室的發現物》為題進行介紹。敦煌熱潮開始引發，發動人即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教授。內藤的文章，直接引述羅振玉的書信，對敦煌藏經洞及其發現的過程、敦煌文書的價值等都做了全面介紹，不僅如此，對伯希和帶走的敦煌文書的精華部分還羅列了書目，這就是：

顏師古玄言新紀明老部五卷。二十五等人圖。太公家教。辯才家教。孔子修問書。天地開闢以來帝王記。百行章。何晏論語集解一、二、六卷。毛詩卷九（鄭注口柏舟訓傳）。范甯穀梁集解（閔公至莊公）。孟說秦語中晉二。莊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郭知言記室修要。文選李善注第二十五、二十七卷。冥報記。新集文詞教林。秦人吟。子賦。李若立略出簾金。老子道德經義疏第五卷。唐韻、切韻（小板五代刻本。均殘）。唐禮圖。輔篇義記二卷。李荃闕外春秋一、四、五卷。唐律一卷。故陳子昂集八、十卷。敦煌十詠。

對照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可見兩者的異同：

顏師古玄言記明老部五卷。二十五人圖。太公家教。辯才家教。孔子修問書一冊。開蒙要訓。天地開闢以來帝王記。百行章一卷。何晏論語集解(存卷一卷二卷六)。毛詩卷九(背口柏舟故訓傳。鄭注)。范甯穀梁集解(存閔公至莊公)。孟說秦語中晉二。莊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郁知言記室修要(按郁疑郭之訛……)。文選李善注第二十五、二十七卷。冥報記。新集文詞教林。秦人吟。鸚鵡子賦。李若立略出簾金。老子道德經義疏第五卷。唐均、切均(小板五代刻本。均殘)。唐禮圖數頁。輔篇義記(存二卷)。新集吉凶書儀二卷。李荃闕外春秋(存卷一卷四卷五)。唐律一卷。故陳子昂集(存卷八卷十)。敦煌十詠一卷。

比較可知兩者基本一致,祇有個別出入。原來的“鸚鵡子賦”寫成“子賦”,丟一“鸚”字,是在哪個過程丟失的不清楚。因為我們引證的不是羅振玉的書信,而是神田喜一郎徵引的文字。“郁知言記室修要”,羅振玉在注釋中已經說明懷疑是“郭知言記室修要”,應該在他的信中徑直修改過來了。“唐均、切均”改為“唐韻、切韻”,與後來的《莫高窟石室秘錄》一樣。“新集吉凶書儀二卷”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介紹。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瞭解到,羅振玉的信,從文章的行文順序看,是在《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之後、《莫高窟石室秘錄》一文之前發出的。因為內容上依然承襲前者,而部分內容已經修改,並在後者得到體現。

十二天之後,從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內藤署名的《敦煌發掘的古書》連續在《朝日新聞》上發表。而這次發表的內容則是根據羅振玉的新文章《敦煌石室秘錄》,因為羅振玉把這篇文章包括部分文物照片寄給了內藤和狩野直喜。在這篇文章中,內藤對重要的敦煌文書逐一進行了介紹,而這些文書就是:1、尚書顧命殘頁;2、西州志殘卷;3、尊勝陀羅尼;4、金剛經;5、溫泉銘;6、化度寺碑銘(唐歐陽詢書);7、老子化胡經;8、景教三威蒙度贊;9、摩尼教景殘卷;10、壁畫;11、沙州志^[26]。

接着,二十八、二十九兩天,京都大學史學會第二次大會在新落成的圖書館召開,從北京寄給內藤、狩野兩先生的敦煌古書、雕刻和壁畫的照片被陳列出來,供人觀賞。此外還配有相關的參考書、金石拓片,陳列品總數達三百多種。不僅如此,圍繞這些敦煌文物,京都大學的先生們還分別進行了很專業的演講。小川琢治主講總說與地理;內藤湖南主講西州志、溫泉銘;濱田耕作主講壁畫與雕刻;富岡謙藏主講尚書顧命、尊勝陀羅尼、金剛經和化度寺碑;狩野直喜主講老子化胡經;羽田亨主講摩尼教景殘卷;桑原鷺藏主講景教三威蒙度贊。直觀生動的敦煌文物照片,專家深入淺出的講解,加之新聞媒體推波助瀾,敦煌熱在日本持續升溫,不僅對日本學術界,即使是對一般社會也產生了極